

利益相容体、比较制度 优势与制度变迁

——区域兴衰中地方政府功能透视

汪摇波摇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目 录

导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1
第二节 研究方法	1
第三节 “面—层—点”复合样本结构	1
第四节 资料来源	1
第五节 研究思路与章节结构安排	1
第一章 “政府、制度变迁与区域兴衰”之理论谱系	1
第一节 “政府、制度变迁与区域兴衰”之生态分析	1
一、国家、社会、第三领域	1
二、新制度主义：生态制度观约束下的理性选择	1
第二节 “政府、制度变迁与区域兴衰”之经济学分析	1
一、“科斯定理”与集体产权理论	1
二、制度变迁与“诺斯悖论”	1
三、发展国家论 与政府失败论	1
第三节 “地方政府、制度变迁、苏南区域兴衰”之理论综析	1
一、理论丛林	1
二、西方研究：“地方政府合作主义”与合作主义的批判	1
三、国内研究：“谋利型政权经营者”与“中介论”，苏南模式终结论	1
四、文献评析：共识、分歧与理论空间	1
第二章 利益相容体与比较制度优势：一个新的理论模型	1
第一节 “政府理性人” 地方政府及政府精英的人性假设	1
一、理性、经济人理性、政治人理性	1
二、政府理性人基本逻辑：双重需求—追求权力—利益—运用权力—行为	1
三、“政府理性人”构成本项研究的基本假设前提	1
第二节 “利益相容体与比较制度优势”理论模型	1

目 录

- 摇摇一、制度变迁理论框架：借鉴与再检验 转页
- 摇摇二、“利益共容体与比较制度优势”理论框架 转页
- 摇摇三、思考的工具 核心概念 转页
- 摇摇一、制度、制度变迁、比较制度优势 转页
- 摇摇二、共容利益、利益共容体 转页
- 摇摇三、苏南模式、新苏南模式 转页
- 摇摇四、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结构与功能、社区政府 转页
- 第三章 制度失衡—制度变迁—比较制度优势—制度失衡
 - 苏南模式制度变迁第一重循环 转页
 - 摇摇一、区域综合资源结构与制度初始性失衡 转页
 - 摇摇一、历史中的苏南早期工业化 过密化？斯密动力？ 转页
 - 摇摇二、吴文化 苏南制度变迁的文化基因 转页
 - 摇摇三、人民公社之初始性利益共容体与社队企业的历史遗产 转页
 - 摇摇二、 “利益共容体 I”、制度变迁与比较制度优势 转页
 - 摇摇一、制度变迁、四元博弈与“利益共容体 I”的形成 转页
 - 摇摇二、社区(乡镇)政府主导与苏南模式比较制度优势 转页
 - 摇摇三、非正式社会规则的双重功能 苏南模式的潜规则 转页
 - 摇摇三、制度失衡与利益共容体 I 解体 转页
 - 摇摇一、苏南模式制度失衡与利益共容体 I 解体 转页
 - 摇摇二、村庄权威与利益共容体 I 稳定性
 - 华西村制度变迁之微观透视 转页
- 第四章 制度失衡—制度变迁—比较制度优势—制度失衡？
 - 新苏南模式变迁第二重循环 转页
 - 摇摇一、利益共容体 II、制度变迁与比较制度优势的重塑 转页
 - 摇摇一、利益共容体 II、制度变迁与新苏南模式崛起 转页
 - 摇摇二、新苏南模式：差异性资源禀赋结构与多模式均衡 转页
 - 摇摇三、地方政府“政策规避”与策略博弈：昆山制度变迁路径 转页
 - 摇摇二、制度变迁过程中权力—市场间互动 转页
 - 摇摇一、权力之退出：苏南改制之制度变迁 转页
 - 摇摇二、权力之再进入：商会与利益共容体 II 再组织 转页
 - 摇摇三、制度再失衡？新苏南模式潜在制度风险 转页
 - 摇摇一、新苏南模式潜在制度风险 转页
 - 摇摇二、精英主导与民众缺位：制度收益的差序性分配 转页
 - 摇摇三、地方政府的职能定位：投资导向？抑或公共服务？ 转页

摇摇四、不确定性：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摇摇远

第五章 摇摇制度变迁与比较制度优势扩展 摇摇远

摇摇第一节 摇摇“自生自发秩序”与地方政府治理机制创新 摇摇远

摇摇一、行政审批改革：地方政府治理机制创新的突破口 摇摇远

摇摇二、异质性区域资源禀赋结构与苏南地方政府机构改革
——盛泽镇与苏北再镇的双重路径比较 摇摇远

摇摇第二节 摇摇产权变革与基层政权运行体制创新 摇摇远

摇摇一、产权制度变迁与民主制度生长 摇摇远

摇摇二、从精英主导到公共选择：基层民主实践与动力机制 摇摇远

结摇摇语 摇摇远

摇摇一、研究结论 摇摇远

摇摇二、研究创新 摇摇远

参考文献 摇摇远

后摇摇记 摇摇远

序 摇言

该专著源于汪波的博士论文。在选题过程中,汪波博士基于已有成果与调研资料,对“权力、制度变迁与区域兴衰”研究表现出浓厚兴趣。我对这一选题方向表示认同,支持他以苏南区域兴衰为实证样本,进行解剖与研究,对相关中西方理论进行梳理与再检验,努力作出有本土特色的理论创建。在论文选题、论证、撰写过程中,王浦劬、徐湘林、陈庆云、沈明明、黄恒学、毛寿龙、金安平、燕继荣等教授,都给予了诸多很有价值的建议。在答辩过程中,论文得到评委较好评价,评为优秀论文,汪波博士也得以提前一年毕业。

该研究遵循政治科学研究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从事实中提炼理论假设,并对其加以检验。自 2004 年始,作者在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昆山、武进、盛泽镇等地进行了长期跟踪调查。通过实地调研、深度访谈获取第一手资料,包括调查记录、访谈资料、组织章程、会议资料、会议记录、协议等文本文献。该书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面一层一点”的复合样本结构。

该研究的样本设计思路为“面一层一点”复合样本结构,即“面为基础,层为结构,点为微观切入”。首先,在面上通过定量统计,对整个区域制度变迁过程形成全面把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区分区域内不同行政层次,并在不同层次上区分“理想类型”,根据这些类型确定所要切入的点,对这些点进行深入调研,获得一手资料。这样,从区域到县市,再到乡镇,再到村,形成“大套中,中套小”复合交叉样本结构。“面一层一点相结合”的样本结构,形成完整而深入的经验网络,既可避免单纯的“点”或单纯的“面”的缺陷,又能对理论假设进行微观、中观与宏观层面的全面检验。

第二,“政府理性人”人性假设的建构。

任何理论范式或理论框架总建立于特定的人性假设前提,只有在相同人性假设前提下,理论之间才可能互相交流与沟通。“政府理性人”试图为地方政府研究构建人性假设前提。“政府理性人”的基本内涵是指:

在特定的制度结构中,政府理性人基于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在利益(公共利益、集团利益、自身利益)的激励下,追求权力并运用权力,实现特定的利益权威性分配以满足特定利益需求,从而实现权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这一基本逻辑链外在体现为:双重需求(物质与精神)—追求权力—三元利益—运用权力—行为。在本研究中,“政府理性人”构成苏南制度变迁研究的人性假设前提。在苏南制度变迁过程中,地方政府既存在实现公共利益的指向,也存在实现地方利益与部门利益的指向,同时存在实现官僚个体利益的指向。这三者既在形式上共存,又存在冲突与矛盾,共处于同一矛盾共同体。在区域制度变迁过程中,地方政府理性人基于所处的“国家—地方政府—社区政府—集体企业—社区民众”利益结构,根据地方政府三元利益属性的对比与动态变化,在与各利益主体的理性互动中,运用权力实施自身偏好最大化的制度变迁。

第三,理论框架的创新尝试。

在对西方制度变迁理论进行借鉴与再检验的基础上,作者提出“利益相容体与比较制度优势”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框架以“政府理性人”为基本前提设定,形成三个层次有机联系与互动的理论体系。作者强调,制度变迁过程中,国家、地方政府、社区政府、企业、社区成员之间的利益结构不是分散、孤立存在,而是形成利益分布的交叉与重合,当不同利益主体间利益交叉,形成潜在一致的“相容利益”时,分散的利益主体为实现“相容利益”,往往进行利益组合,以“团块组合”形式结成利益结盟,可把这种“团块组合”形式的利益结盟称之为“利益相容体”。“利益相容体”体现为四种特征:利益性、“组合—裂变”之动态性、利益分配的“差序性”、利益分享的排他性。作者进一步指出:当制度变迁取得比较制度优势,满足相关利益者的利益需求,利益相容体得以维持和发展。当制度变迁不再具有比较制度优势,无法获得充分的增量收益,以满足相关利益者的利益需求,利益相容体难以维持,走向分裂,因而形成制度变迁与利益相容体的组织结构变迁的动态互动。

第四,实证研究技术手段的综合运用。

实证研究的技术手段主要体现为:(员)博弈模型的运用。本研究基于政府理性人这一基本假设,在不同的制度情景下,广泛运用博弈模型对政府理性人之间的理论博弈进行分析,探讨国家—地方政府—社区政府—集体企业—社区成员基于各自利益偏好进行协商、谈判、互动,如何通过互动就制度变迁的目标函数达成一致契约?如何达成制度分配的合约?(圆)定量统计与定量比较。充分利用获得的相关经济统计数据,建

立统计图表,并对数据进行交叉比较,发现变量数据相关性与否,并挖掘背后因果机制。充分利用获得问卷调查数据,通过初步统计,发掘变量数据相关性。(3)定性比较。定性分析既有个案剖析,也有两个及两个以上案例的比较,两种及两种以上理想类型的比较。通过比较,能够挖掘现象背后自变量与因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机制。

作为一名初入学术界的青年学者,该成果难免在一些方面存在疏漏与不足。作为作者的博士导师,我希望专家学者和读者不吝赐教,也期望作者能够汲取专家意见,继续深入研究,努力作出具有本土特色的研究成果。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北大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长谢庆奎
2014年 9月 12日

谢庆奎

liyigongrongti、bijiao zhidu youshi yu zhidu bianqian

导摇摇论

排除掉政府的市场理论,或者纯粹地把经济作为外生力量的政治概念,本质上是有限的和不平衡的。它们不能告诉我们更多的关于政府形式与经济财富之间的关系,或者不能充分解释为什么有些社会更加富裕而有些社会更加贫困的缘故。

——曼瑟·奥尔森^①

第一节 摇摇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权力、制度变迁与经济兴衰”是几个世纪以来政治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经典命题。早在1544年左右,意大利的斯伊纳(佛罗伦萨)共和国的领导人委托艺术家安布鲁吉奥·劳伦扎蒂(佛罗伦萨)以此为题材创作了两幅壁画。题目分别是《坏政府的寓言》和《好政府的寓言》。在劳伦扎蒂壁画中,坏政府是由一位暴君的肖像所代表,他坐在断壁残垣前,主持着邪恶堕落的政务:残暴、背信、欺骗、分裂、好战、贪婪、骄傲以及虚荣等等。围绕着暴君形象的是各种各样的掠夺行为,例如战争、犯罪和对正义的践踏。相反,墙的右边绘画了共同的善的形象,主持着诸如和平、正义、智慧、信念、仁慈、高尚以及和谐为代表的好政府的事务。与好政府壁画相联系的则是好的城市和好的国家这两个画面,展示了在成功治理安排下繁荣景象。这些壁画对展示当时斯伊纳内部的治理状态很有意义,但是委托做这些壁画的政权由于瘟疫、查理四世的外部威胁、以及其内部的利益纷争而崩溃了。这两幅壁画以一种简明生动的方式提出这一政治经济学经典命题,即政府权力、制度变迁与国家(区域)兴衰的逻辑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层层深入展开,中国社会正

摇摇

^① [美]曼瑟尔·奥尔森著,苏长和译:《权力与繁荣》,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源页。

从产品经济向市场经济结构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在此社会经济背景下,1980年代以来放权让利改革战略和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实施,地方政府已不再是被动贯彻中央政府行政命令的附属组织,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关系日益从命令—服从单维逻辑转向博弈与服从并存的双向逻辑。地方政府兼具区域经济调控主体和经济利益的双重角色,地方政府开始扮演推动地方市场化进程及制度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角色。地方政府权力主导下的区域经济逐渐形成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诸多差异性模式。在此进程中,地方政府间关系日益转向竞争状态,地方政府本身结构—功能亦不断动态变化。谢庆奎教授主编的《中国地方政府管理》丛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1995年陆续出版)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地阐述当代地方政府理论的丛书,^①这套丛书对政府规范、政府环境、政府结构、政府功能、政府运行、政府发展均进行了深入研究,1994年,谢庆奎教授又进一步提出该领域的近期和中期的研究方向,尤其强调应加强政府运行机制、当代中国政府与公共政策、中国地方政府与政治的研究。^②依据这一研究指向,本研究定位于经济转型与财政分权的宏观背景下,苏南发展模式双重循环中地方政府(主要指县与镇基层政府)经济政策变迁以及权力运行机制的动态逻辑。

苏南发展路径既具有宏观政治经济环境与正式制度约束所形成的共性特征,又具有其区域独特性。苏南发展模式变迁经历了双重循环,传统苏南模式变迁经历了第一重循环:制度环境变化——制度失衡——制度变迁——制度均衡——制度失衡;新苏南模式经历第二重循环,制度失衡——制度变迁——制度均衡^③。从建国以后到1970年代末,苏南农村经历了集体化和合作化运动,以及从公社队到乡镇队、镇民小组的行政建制变迁。19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后,脱胎于草根中的苏南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率先形成制度性崛起,集体经营、共同劳动、协调分配为特征的

插图

① 该套丛书计有《中国政府体制分析》、《中国政府职能的经济分析》、《省政府管理》、《市政府管理》、《行署管理》、《县政府管理》、《乡政府管理》、《镇政府管理》、《特别地区政府管理》、《中国地方政府体制概论》等10本。这套丛书对政府规范、政府环境、政府结构、政府功能、政府运行、政府发展均进行了深入研究,该丛书开拓了政府研究的对象、范围和视野,反映了特定历史阶段下地方政府优秀研究成果。

② 参见谢庆奎主编:《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丛书》序言,经济日报出版社1994年版。

③ 关于概念内涵的简要界定,制度失衡指制度均衡指没有新的变迁。制度变迁指一种低效率制度向高效制度的变迁,制度均衡指这样一种状态,在给的一般条件下,现存制度安排的任何改变都不能给经济中任何个人或任何团体带来额外的收入。概念内涵参考了诺斯与戴维斯《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1993年版。

社队经济,转变为乡镇企业为支柱的集体经济,形成了“公共权威—集体经济”的政经共同体结构。苏南模式在 1980 年代中期达到发展高峰期,当人们开始为传统苏南模式唱赞歌时,进入 1990 年代中后期,客观事物又显示新的面貌。传统苏南模式在 1990 年代中后期逐渐衰落,有人谓之“苏南模式的终结”^①。随着温州模式在党的十四大以来的兴起,人们转而称颂温州模式,苏南集体模式的是非功过形成了学术和政策争议的热点。新世纪以来,温州模式开始呈现相对衰落迹象,而“新苏南模式”呈现在人们眼前。这一系列跌宕起伏、丰富多彩的模式兴衰循环,似乎清楚地显示出“政经相容悖论”:政经一体化的利益相容体既可导致区域繁荣,亦可导致区域衰退。

苏南制度变迁之双重循环不是一个静态的经验事实,而形成一种持续的动态经验运行过程;它不仅是经济过程,而且是甚至主要是政府过程;它不仅涉及经济主体间的生产行为、交换行为,而且涉及到权力的价值权威性分配、权力主体间关系、政府精英行动、中央与地方财政制度结构、地方政府间竞争、基层政府机构与职能变迁。随着两次改制的展开,苏南区域政府与制度关系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倒 U 型结构,制度不仅是政府实现政治经济目标的理性工具,随着市场经济所衍生的生产与交换自由秩序的形成,制度由工具理性日益转向价值理性,政府权力运行范畴与程序日益受到政府培育的“自生自发秩序”^②的反约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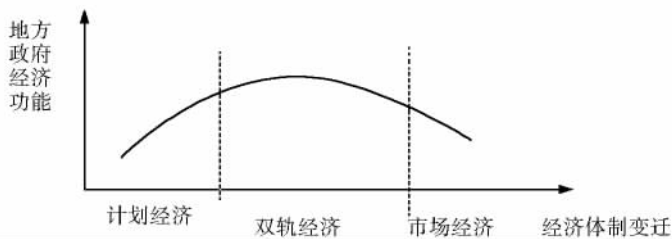


图 1 苏南经济体制改革与地方政府经济功能变迁

摇摇这一经验事实的复杂性不禁让人重新思考“政府、制度变迁与区域兴衰”的这一经典命题,国内外学者基于不同的经验基础,形成了对这一命题的形形色色的理论成果(详见文献综述)。就苏南研究来看,现有国内外研究成果大多局限于苏南模式与乡镇企业的研究,对新苏南模式与两次改制后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则较少涉及。苏南模式与乡镇企业研究

摇摇

① 关于“苏南模式的终结”这一提法,参见新望《苏南模式的终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3 年版。

② [美]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187 页。

又主要形成两大冲突的理论进路：从政府善恶假设而衍生的组合主义论、合作文化、新集体主义论。从政府恶的假设而衍生的终结论、掠夺论（相关评论详见文献综述）。随着新苏南模式新世纪以来的兴起，现有的分析进路与理论假设需要动态经验事实进一步证伪。单纯经济分析或政治分析、单纯的传统苏南模式分析或新苏南模式分析，单纯善或恶的政府假设，皆不足以充分解释这一动态经验事实。基层政权在苏南模式变迁之双重循环中结构与功能、定位与调整仍需深入调研的基础上进行检验与研究。

这一命题可从两个纬度加以考察。在理论纬度上，这一命题体现为：在中国转型时期，地方政府、制度变迁与区域兴衰之间存在何种内在因果联系？在区域兴衰背后，地方政府是否发挥作用，发挥何种类型作用，如何发挥作用？制度是政府实现政治与经济偏好的理性工具，抑或是约束政府行为的宪政规则体系？历史、地理、文化对政府结构—功能变迁是否以及如何产生影响？在经验纬度上，这一命题体现为：在苏南发展模式之双重循环背后，政府、制度变迁与区域兴衰之间互动逻辑链如何展开？为什么苏南模式未能在高峰时期推进制度变迁，完成产权改制，而是苏南模式相对衰落后，在温州模式的刺激下，才重新启动“外源型”制度变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的完善与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到来，在“新苏南模式”制度环境结构中，苏南基层政府结构与功能定位发生了何种新变化，新变迁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体现了何种发展趋向？

本文以基层政府在苏南制度变迁中之双重循环中的结构功能变迁为经验基础，对既有理论假设进行梳理与再检验，在此基础上完成逻辑建构，努力对研究问题作出逻辑自洽的解答。研究的终极目标是对已有经验进行解释，对现实提供参考，对未来提供预测。若本研究能对地方政府与区域兴衰的内在规律有所揭示的话，便是该研究的可能的现实意义，也是本研究的理论价值所在。

第二节 摇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对象“苏南制度变迁之双重循环”可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纬度加以定位。时间纬度主要定位于 ~~1978—1992~~ 1978—2005 年，在这一时间纬度中，苏南制度变迁经历了双重循环，传统苏南模式变迁经历了第一重循环：制度环境变化——制度失衡——制度变迁——制度均衡——制度失衡；新苏南模式经历第二重循环：制度失衡——制度变迁——制度均衡——制度

摇原

风险。从空间纬度看,研究对象定位于苏州、无锡、常州所构成的苏南区域。研究对象时间与空间的界定是有弹性的界定,而非僵化的切割。政治经济生活中研究对象从来都是在历史中动态演进,事物发展逻辑本质上无法被研究者主观选取的历史时空所割裂。因此,本研究以苏南制度变迁之双重循环为研究时空范畴(1978—2012年),但又不完全局限于此,在历时性纬度向历史时空纵深加以延伸,在共时性纬度向不同区域空间的发展模式进行横向扩展,通过纵横比较作为研究的辅助性工具,在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结合的比较过程中,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

本研究论文努力遵循政治科学研究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尽管事实与价值难以分离,但研究过程尽可能用事实说话(谨此解释清楚,以免有误解),从事实中提炼理论假设,并对其加以检验,“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①本项研究描述、分析与预测相结合,描述是分析的基础,即基于实地调研、文献考察、历史求证、经济数据,对利益共同体结构下苏南制度变迁之双重循环路径进行客观勾勒。分析是研究的核心,即在定性与定量充分数据的基础上,消化已有理论成果,对变迁路径进行案例比较分析与量化统计分析,挖掘变迁路径背后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因果关系,从中得出初步理论假设,努力从中观层面为我国政府经济学研究提供纵向知识积累。预测则是本研究理论假设的现实应用,即通过理论因果关系逻辑演绎,为政府发展与经济发展提出若干谨慎的预测和建议。本研究努力遵循政治科学研究方法,力图对研究问题作出实证性解释,但社会科学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社会现象盘根错节、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理论假设很难得到科学实验般精确性检验。研究者对特定问题往往已形成先验性价值判断,经验事实经过无形的“价值过滤”而得出的理论假设难免受到精确性质疑。^②社会科学研究中理论假设难以获得绝对精确性和普适性,任何理论假设的提出与论证都离不开价值的潜在影响。本文研究方法以实证分析为主,规范分析为辅。规范分析“是从主观的角度切入政治问题,目标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54页。

② 在研究手段和研究程序来说,现阶段政治科学已经越来越科学化,但是就研究成果的验证来说,政治科学还远未成为科学(宁骚,1999)。即使政治学研究大师的基本理论观亦会随经验变化而变化,亨廷顿在20世纪70年代在《变革中的社会秩序》著作中对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进程采取了悲观主义态度,强调政治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制度化,演绎出“强大政府论”。但随着20世纪末期席卷全球范围的民主化浪潮,他在80年代不再强调政治秩序,在《第三波》中为民主化摇旗呐喊,抛弃所谓“价值中立”的科学立场。

框架有选择地或突出一些变量,或忽略另一些变量,从而形成具有差异性的变量间基本逻辑关系结构(所谓范式、模式、理论框架等)。本文在借鉴与再检验既有理论进路的基础上,依据区域样本结构,提出本文的中观层面理论框架^①:“利益相容体与比较制度优势”理论框架,以求更有效解释转型时期苏南制度变迁之双重循环。研究分析框架作为研究方法的具体延伸,在第二章详细而独立展开。

第三节摇“面一层一点”复合样本结构

本研究的样本选取与设计思路为“面一层一点相结合”复合样本结构,即“面为基础,层为结构,点为微观切入。”在政治学实证研究中,样本选取主要存在三种思路。

第一种思路:面的概括。研究样本建立于国家或区域的宏观层面,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获取宏观层面的定性或定量数据,并对之进行处理,形成层面上的经验网络,并不追求微观层面的剖析。由于政治科学研究始终面临“不完全归纳”的难题,“面的概括”有助于从宏观与中观整体上对研究对象进行把握与了解,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不完全归纳”难题。但单纯“面的概括”往往导致大而全式表面研究,如同浮在水面的油,无法深入进入研究场景。由于研究者缺乏具体“点”的经验根基,往往无法提出具有深度的理论命题,甚至很难提出具有现实与学术意义的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言:“倘若走马看花,‘到外只问一下子’,那便是一辈子也不能了解问题的深处。这种研究方法显然是不对的”,“我们研究城市问题,也是和研究农村问题一样,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②在调查对象的选择上,毛泽东提出并运用两种方法:一是选择同类事物中最能代表一般的个别;二是划类选点,把一类事物分为几个亚类继而分类调查。“怎样找调配的典型?调查的类型可以分为三种:一、先进的、二、中间的、三、落后的。如果能依据这种分类,每类调查两三个,即可知一般的情形了。”^③这就要求研究样本的选取应点面结合,由面入点。

^① 徐湘林教授认为:“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实际问题需要更加细致的、更加切合实际的中型理论和政治分析工具,这一现实问题恰恰被政治发展理论忽视了。参见徐湘林:《从政治发展理论到政策过程理论——中国政治改革研究的中层理论建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7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7页。

第二种思路:点的切入。研究样本选取某一村庄或某一单位,直接进入村庄,从村庄兴衰来反映整个区域制度变迁,费孝通教授相信:“通过类型比较法是有可能从个别逐渐接近整体的……这个方法我至今认为是有价值的,但是也已经看到它的不足。”^①并对这种方法的不足曾作过阐述,“美国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雷德菲尔德(Redfield)教授也主张微型分析,但是他后来也感到研究一个文化较高的农民社区,应当注意到这个社区在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与城镇的联系。这就对我过去的方法指出了不足之处了。对中国农村的调查不能限于农村,因为在经济上它是城乡网络的基础,离开了上层的结构就不容易看清它的面貌。在意识形态上,更受到经济文化中心洗练过用来维持一定时期的整个中国社会的观念体系所控制。这里存在着一个立体的上下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但是怎样在微型分析的基础上来进行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当时我并没有真正解决。”^②个案调查具有经验直观性,但个案研究可能无法分清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可能以偏概全。“截取一定时期的横断面对一个村进行考察,有助于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但难以解读现象和事件的来龙去脉。”^③“以往的乡村研究大多是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研究领域大多限于一个村的社区范围,属于社区型研究。这种研究被视之为‘解剖麻雀’。……乡村政治的形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国家的基因自然天成于乡村。离开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是无法解剖这只麻雀的。”^④苏南区域研究难以从某点切入得出完整的区域结论,因为无论苏南模式,还是新苏南模式,皆存在异质性子模式,各社区政府依据社区资源禀赋结构,推进差异性的制度变迁路径,新苏南模式尤为明显。这使得研究者难以从一个或两个乡村样本得出区域结论,从而要求宏观、中观、微观结合,通过多层次、多点样本深入考察与互动,形成区域研究的交叉的复合的经验网络。

第三种思路:“面一层一点”复合样本结构。研究调查研究设计中,点与面的结合不仅重要而且必要,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从已有的基础上做起,然后由点及面,找典型、立模式,逐步勾画出比较全面的轮廓。”^⑤本文研究样本设计为“面层点相结合,由面到点,层层深入”。首先,在面上通过定量统计对整个区域制度变迁过程形成粗略的整体把握;在此基

插图

① 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75页。
② 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75页。
③ 徐勇:《岳村政治序言》,于建嵘:《岳村政治》,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75页。
④ 徐勇:《岳村政治序言》,于建嵘:《岳村政治》,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75页。
⑤ 费孝通:《行行重行行》,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5页。

基础上,进一步区分区域内不同行政层次,并在不同层次上区分“理想类型”根据这些类型确定所要切入的点,对这些点进行深入调研,获得第一手资料(亦可借鉴他人调研所获取资料),这样,从区域到县市,再到乡镇,再到村,形成“大套中,中套小”复合交叉样本结构,“面—层—点相结合”的样本结构形成研究的完整而又深入的经验网络,更能对研究拟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全面检验。更为重要的是,微观层面的案例经验与区域层面的定量数据形成互动与相互检验,只有微观、中观、宏观事实与数据能够相互证明时,理论假设才能通过强检验。具体而言,本研究“面—层—点相结合”复合样本结构”选取思路表现为:在面上,调研范畴界为苏南区域,包括苏、锡、常三市;在层次上,主要确立县市级、乡镇级和村级三个研究层次;在点上,调研样本选取四个典型:昆山市(苏州市所辖县级市)、江阴市(无锡所辖县级市)、盛泽镇(苏州吴江市所辖镇)、华西村(江阴市所辖村),从市县、乡镇、村三层政权互动结构来考察制度变迁过程。“面—层—点相结合”复合样本结构构成区域研究的综合经验网络,由于社区(乡镇)政府在苏南制度变迁的主导性地位,本研究重点考察盛泽镇政府在苏南制度变迁中权力与经济互动过程。

表 园 瑶 “面—层—点”复合样本结构

样 本 特 征 样 本 层 面	样本名称	地理区位特征	典型特征
区域层面	苏州、无锡、常州	长江三角洲中部,吴文化	乡镇企业之苏南模式,多元化新苏南模式
县市层面	样本:昆山	苏州市所辖县级市	百强县第一县;外向经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推动
	样本:江阴	无锡所辖县级市	百强县;内生经济;江阴板块
乡镇层面(核心)	重点样本:盛泽镇	苏州吴江市所辖镇	全国百强乡镇之首;四大绸都之一;商会传统
村层面	样本:江阴华西村	无锡江阴市所辖村	集体经济 权威治理

瑶瑶区域层面。苏南位于太湖之滨、长江三角洲中部,素有“鱼米之乡”之称,这一区域在明清时期便是闻名中外的商贾云集之地,家庭手工业、纺织业就已经相当发达。苏南地处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等发达城市所

形成的工业走廊边缘,距市场中心较近,运输成本较低,容易获取快捷的产业延伸与技术支持。区域社会、经济、文化资源禀赋结构为地方政府制度创新提供了制度变迁的有利环境。调研范畴为苏南区域,包括苏、锡、常三市。(员)苏州是江苏省下辖地级市,位于江苏省东南部,太湖之滨。人口 544 万。南临浙江省,东接上海市,北依长江,西濒太湖。距南京市 183 公里,距上海市 150 公里。水乡古城特色使其有“东方威尼斯”之称。苏州处太湖平原,沿江为高沙平原,河湖密布,属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有内河航道 2460 千米。京杭运河纵横贯境,构成水陆交通动脉。苏州,古代名称有句吴、吴、会稽、吴州、吴郡、平江等。苏州别称有吴都、吴会、吴门、东吴、吴中、吴下、姑苏、长洲、茂苑等。1982 年,实行市管县体制,撤销苏州地区,苏州市辖 5 市(常熟)缘县(太仓、昆山、吴县、吴江、沙洲)源区(平江、金阊、沧浪和郊区)。1983 年,沙洲县改设张家港市。此后昆山、吴江、太仓和吴县陆续改设县级市。1989 年,苏州被国务院批准为“较大的市”,拥有部分立法权。(圆)无锡位于长江三角洲江湖间走廊部分。东邻苏州,距上海 150 公里,南濒太湖,与浙江省交界,西接常州,去南京 150 公里,北临长江,与泰州市所辖的靖江市隔江相望。无锡是历代王朝的漕运要地,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苑条水运干线沟通相连,富庶的鱼米之乡,便捷的水陆通道,孕育了著名的“无锡米市”和“布码头”。沪宁铁路加快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使无锡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之一。无锡市下辖无锡县、江阴市、宜兴市三个县市及崇安、南长、北塘、郊区、马山、新区六个区,总面积为 5214 平方公里,总人口约 540 万。其中市区面积 521 平方公里,人口约 54 万。(猿)常州地处江苏省南部、长江下游平原,东濒太湖,与上海、苏州、无锡相邻,西与南京、镇江接壤,南与安徽交界,北襟长江。1982 年,常州市行政区划设 缘区猿市。市区设天宁、钟楼、戚墅堰猿个城区(下辖 5 个街道办事处, 圆个镇, 猿个居民委员会, 5 个村民委员会),郊区含新区(下辖 源个镇, 5 个乡, 远个居民委员会, 5 个村民委员会),武进、金坛、溧阳猿市下辖 缘个乡, 远个镇, 圆个街道办事处, 5 个居民委员会和 5 个村民委员会。土地面积 5214 平方公里,人口 猿猿猿 万人,其中市区 圆缘平方公里,人口 缘缘 万人。市区在长江下游南岸、沪宁铁路中段,沪宁高速公路、猿圆国道、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全市水网纵横交织,连江通海。